日本防卫费将不设上限 战后和平主义面临崩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第77个“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临近之际，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出现进一步瓦解的迹象。7月30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各省厅向财务省提交2023财年初始预算要求的基本方针。会议决定，防卫费将作为特例不设上限，具体细节将在今年年底探讨。财务省称，这是日本首次对防卫费破例处理。

自2013年起，日本防卫费“小步快跑”，已连续10年增长。要“继承安倍晋三遗志”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已明确表示，将在5年内“彻底加强”日本防卫力，确保“相当大程度”增加防卫费。日本欲突破防卫费“天花板”、谋求军事“完全松绑”的野心昭然若揭。随着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中的席位均超过三分之二，日本政治和军事右倾化被认为将提速，地区国家对日本终结战后和平主义、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担忧进一步增加。日本创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乌尔夫·汉森近日在一篇文章中说：日本国家层面的和平主义已经死亡。

“1%”的惯例“红线”或将突破

在日本战后宪法中，和平主义是三大原则之一。自1976年以来，防卫费占比不超过GDP的1%，一直是日本历届政府设定的“红线”，也被视作日本是否奉行和平主义的关键指标。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防卫费占比只在2010年突破过GDP的1%。

2010年代，一直主张修宪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秉持军事强硬路线，不断增加防卫预算，他也多次被批评将带领日本走向“能战国家”。岸田文雄虽自称“鸽派”，但他在外交安保领域承袭的是安倍路线。综合今年3月通过的2022财年预算案和2021年度补充预算，日本本年度实际防卫费超过6万亿日元，事实上已突破了防卫费占比不超过GDP1%的惯例“红线”。

今年年内，日本政府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3份外交安保文件。自民党4月在意见书中提出，“鉴于北约成员国的防卫预算占GDP的2%以上，为了在5年内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日本也必须达到相应的预算水平。”有分析指出，此举很可能成为日本防卫策略的转折点，标志着日本将违背“和平宪法”，彻底转变“专守防卫”政策。

向北约看齐、将防卫预算占比提高到GDP2%的有关内容，也写入了今年6月的“岸田版”首份“骨太方针”(2022年度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基本方针)之中。“骨太方针”体现了日本政府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编制下一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依据。如果日本在未来5年内将防卫费占GDP的比例从1%提高至2%以上，意味着日本防卫开支将在5年后实现5万亿日元的增量，日本届时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军费支出国。

日本不断谋求增加防卫费，核心诉求之一是发展自卫队的进攻作战能力，包括采购中程导弹、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研发和建造进攻性武器、强化反制反击能力等。此外，日本近年来还在着手拓展太空、网络空间和电子战等安保新领域。

7月22日，日本发布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新增了强调提升远程“反击能力”重要性的内容，并称此种打击不属于“先发制人”范畴、不违反国际法和日本“和平宪法”。在新版白皮书详述的今年防卫预算基本构成中，新增的500多亿日元国防支出以研发费用为主，涉及反舰导弹性能提升、电子战装备、高功率微波武器、无人舰艇等。由此，“研发”被认为可能是未来日本大幅扩充防卫费的重点方向。

安倍遇刺被利用成“悲情催化剂”

日本防卫费不断膨胀，“钱从哪儿来”一直是日本民众关心的问题。近年来，日本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一波又一波的疫情高峰和防疫投入，进一步增加了日本财政负担。当前日元大幅贬值，日本经济面临多重压力，使得日本防卫预算愈发捉襟见肘。有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在提升防卫能力的同时，需要考虑税收分配和国民负担；如果没有开源手段，反而会削弱日本的防卫能力。

安倍晋三曾提出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填补防卫预算。按照安倍今年4月在一次派阀会议的说法，用防卫费购置的设施和装备能够留给下一代，因此可以仿照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债”一样，发行“防卫国债”。安倍的这一主张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担忧。《每日新闻》今年6月在一篇社论中直言并警告说，二战期间日本就曾有过乱发战时国债导致无限度军事扩张的教训；日本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在2021年度末已突破1000万亿日元，增发国债可能让日本下一代背上更为沉重的债务。

7月22日，日本东京，民众冒雨抗议日本政府决定9月27日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人民视觉供图

挑战“和平宪法”边际的同时，日本将其防卫预算“对标”北约，也是为了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寻求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今年5月，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首次面对面会晤时表示，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力，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负责任”，拜登对此强烈支持。

但是，英国《金融时报》7月31日援引日本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三菱重工方面的表态报道说，正是因为对美国进口的过分依赖，导致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陷入困境”，国防供应链出现“危机”。早在2020年6月，《朝日新闻》就曾以“疯狂购买美国武器，日本自卫队装备体系畸形”为题发文指出，美国依据“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向日本出售大量武器，但这并不是“援助”，实际上费用由日方全额负担。日媒预计，从9月开始，日本防卫省和财务省将就增加防卫费预算问题进行博弈。

可以看出，安倍晋三增加防卫预算的主张，长远地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国防路线。2015年的“允许日本自卫队自二战以来首次在海外作战”新安保相关法案，正是在安倍任内通过的。就在安倍晋三7月初遇刺身亡前夕，他还在大力宣传其“防卫费翻番”主张。有分析认为，安倍遇刺事件很可能被自民党和日本现政权利用成“悲情催化剂”，为日本突破防卫费惯例限制营造舆论氛围。

“外部威胁”一直是日本扩充军力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改选中，除社会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外，日本绝大多数政党都表示支持增加防卫预算。时事通讯社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反映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国内对外部环境的高度担忧。日本自卫队原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声称，“日本与中国、朝鲜和俄罗斯邻近，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日本的安全环境尤其严峻。”

渲染外部威胁一直是日本谋求军力扩张合理化的手段。2013年，日本时隔11年之后首增防卫费，当时的借口就是要加强对钓鱼岛的警戒巡逻态势、应对朝鲜发射“人造卫星”等周边国家突发事态。庆应大学财政社会学教授井手英策分析指出，炒作危机、恫吓民众、鼓噪扩军，日本正在向右“崩塌”。

近一段时间，日本频频在涉华和俄乌议题上借题发挥。在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老调重弹”，对“中国军事动向”表示“强烈担忧”。白皮书还大幅增加了涉台内容，强调要与盟国密切合作，紧密关注地区动向。此外，俄乌冲突在新版白皮书中单独成章，提到俄罗斯今后会进一步密切对华协作，还再次暗指台海局势。

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7月下旬先后予以强烈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的错误做法。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我们要求日方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停止以受害者的伪装混淆国际视听，停止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切实以负责任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本报北京8月3日电

以色列首次承认核武能力 再次凸显美国核双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8月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在之后的26天里，各国代表将就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等进行谈判。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并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字国，也没有参加本次会议，但在这一敏感时段，以色列总理拉皮德8月2日在公开场合罕见地承认了该国的核武能力。作为美国核双标的例证之一，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美方就AUKUS无核地位作出的“保证”。

拉皮德所言“其他能力”是什么

世人尽知，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核武器大国，但其官方从未公开承认。正因为如此，拉皮德8月2日在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领导人换届大会上发表的一番公开讲话，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拉皮德说，以色列国家安全是由防御能力、进攻能力和“其他能力”决定的。“我们头顶上的安全苍穹，是基于防御能力、进攻能力和外国媒体所言的‘其他能力’。‘其他能力’才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得以在这片土地生存下去的真正保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道中说，拉皮德所说的“其他能力”，通常是指核武器。

以色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发核武，目前据信拥有超百件核武器，但以色列官方此前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一事实，数十年来一直对此讳莫如深。上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以色列国防部次长的佩雷斯曾表示，以色列当然不会是首个将核武器引入中东地区的国家。2006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以色列与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一样“拥有核武器能力”，将自己列入核国家行列；但以色列总理府此后就奥尔默特的这一“口误”进行了“澄清”。2020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不小心说漏了嘴，说以色列拥有“核力量”；但他很快就改口称，他先前的讲话“指的是核能源”。

拉皮德8月2日公开大谈以色列的“其他能力”，CNN报道说，他由此成为首位承认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国家领导人。

以色列核武从哪里扩散而来

虽然以色列官方一直遮遮掩掩，但很多人都知道以色列获得核武能力的大致过程。眼下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叫嚷得最凶的美国，正是以色列获得核武器的根源。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纽梅克公司总经理夏皮罗的配合下、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放水”下，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特工从美国“偷走”了多达178公斤的浓缩铀。此后，摩萨德特工又以欺骗方式从欧洲搞到了200吨左右氧化铀。到1969年3月，以色列已经拥有了可随时起爆的原子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一度下令核部队进入最高战斗状态，准备对埃及使用核武器。

目前，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拥有100-200颗核弹，足够毁灭整个中东。以色列也是当今世界仅次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第六大核武器大国。

《纽约时报》2021年8月12日在一篇报道中透露，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进行掩盖，是由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以色列前总理戈尔达·梅厄达成的一项协议——两国均不会声明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美国承诺不对以色列施压，使其核计划接受国际监督控制。美国政治分析家彼得·贝纳特表示，美国政界人士一直警告说，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在整个中东地区掀起一场核武器竞赛。美国的这些警告似乎暗示该地区现在没有核武器，但事实是，以色列早就拥有了核武器。

贝纳特分析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领导人一直装作对以色列核计划一无所知，这种欺骗行为与美国的防止核扩散承诺相违背，扭曲了美国正在参与的伊朗核谈判。拜登政府沿袭前政府政策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迫使其同意接受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要求更为严格的核检查。与此同时，美国对从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以色列视而不见，也不允许对以色列进行任何相关检查。“这种虚伪做法导致，当美国外交官声称他们是在捍卫‘规则主导的世界秩序’时，世界各地的许多政治人物都会发笑；也使不少人转而支持伊朗的观点，认为伊朗有权拥有与其地区竞争对手以色列同类(武器)。”贝纳特呼吁拜登政府停止掩盖以色列的核计划和核能力，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事情真相；“就以色列核武库问题展开坦诚讨论，可能为遥不可及的中东无核梦想注入灵魂”。

7月14日，耶路撒冷，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左)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右)共同签署《美以战略伙伴关系耶路撒冷联合声明》。声明再次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人民视觉供图

最应该被约束的是美国

拉皮德此时公开承认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至少在时间节点上，与美国政府最近的涉核表态不无关系。

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开幕前的8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出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作为一个有核国家的义务，美国致力于实现一个无核世界；美国正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AUKUS符合最高的核不扩散标准。

AUKUS是由澳大利亚(AU)、英国(UK)和美国(US)于2021年9月15日联合宣布成立的军事外交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联盟。该联盟的首要目标是由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该联盟也是构筑美国新印太战略联盟合作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1日参加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时拍胸脯保证称，澳大利亚将购买的潜艇仅配备核电站，不会配备核武器，将满足最高安全和防扩散标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有充分理由不接受有关AUKUS项目“无核”地位的解释；中国正在与合作伙伴协调，以防止美英澳联盟进行核扩散。

在中国8月1日接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新闻吹风会上，张军再次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涉及武器级浓缩铀及相关技术的转让，将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张军提醒说，AUKUS的实际内容，与参与者“不扩散核武器”的声明并不一致。美国、英国在多个场合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表达关切，却在与澳大利亚核潜艇合作问题上大开绿灯，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联想到拉皮德破天荒地承认以色列核武能力，以及其核能力的来路、美国的遮掩和放任，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双标”可谓赤裸裸。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正义力量完全有理由质疑美国关于“确保AUKUS符合最高核不扩散标准”的表态和承诺。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帕维尔·卡缅诺夫所说：“中国完全有理由对AUKUS军事联盟表示严重关切，不相信美国就该联盟无核地位作出的保证。”

本报北京8月3日电

能源危机继续发酵 德国经济模式或将终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欧洲各国都在“能源荒”导致的一系列危机中苦苦挣扎。作为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零，企业因能源短缺被迫关停业务，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正在滑向“能源贫困”……德国是否将成为全球能源危机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冬天还没到，德国人提前过上苦日子

作为德国总统府，承载着德国历史记忆的贝尔维尤宫是柏林市地标建筑。但从7月25日开始，入夜后，这座新古典风格建筑的灯光不再亮起，跟勃兰登堡门、红色市政厅等柏林其他公共建筑一样陷入黑暗。

离冬季还有3个月，德国人早早感受到了来自能源危机的彻骨寒意。天然气危机持续发酵，德国各地纷纷采取节能措施，希望减少能耗，将节省下来的能源留给冬天。

柏林市和慕尼黑市政府宣布一系列节能措施，包括入夜后关闭市政建筑和喷泉的照明，不再向办公室、健身房和体育场馆供应热水等。德国经济部号召民众减少使用空调、缩短洗澡时间、将冰箱温度上调1摄氏度、出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奥尔登堡市市长尤尔根·克罗格曼对民众宣传说：“夏天洗冷水澡总比冬天住冷公寓要好。”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洲各国立即采取天然气限量供应措施，力争到明年3月1日将天然气使用量减少15%，“为俄罗斯天然气的全面断供作好准备”。如果届时仍然无法实现供需平衡，德国政府将宣布天然气供应进入“紧急状态”，对天然气实行配额供应。虽然民宅、医院等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不会受到停电影响，但“不能保证室内温度像过去一样舒适”。

飙升的能源价格持续推高通货膨胀率，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因能源致贫”。科隆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约25%的德国人已陷入“能源贫困”，即取暖和照明成本影响了承担其他生活消费的能力。经济学家马克西米利安·斯托克豪森指出，尽管能源成本飙升通常对贫困家庭造成的影响更大，但“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能源成本上升的影响”；“中下收入阶层”成为“能源贫困户”的可能性是一年前的两倍。

对需要大量能源才能运转的一些企业而言，“凛冬”或许已提前到来。一项调查显示，16%的德国工业企业正在考虑减产或放弃某些业务，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能源价格飙升导致无法盈利，巴斯夫将减少化肥原料氨的生产。该公司还打算放弃部分电力和蒸汽业务，把省下来的天然气再卖回电网。

德国联邦统计局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零，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供应链断裂、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莫里茨·克雷默预计，2023年德国经济将出现“相对温和”的负增长；“但如果俄罗斯终止天然气供应，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德国失业率也一路攀升，原因之一是“就业市场接纳逃往德国的80万乌克兰难民”。法新社认为，各项指标都表明德国经济即将进入黑暗期。

替代俄罗斯天然气，德国的选择不多

德国是世界第五大能源消费国，其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依靠进口。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2019年天然气消费约占其初级能源消费的25%，近半数德国家庭依靠天然气取暖。

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约占德国天然气总量的50%到75%。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追随美国对俄罗斯采取全方位制裁。作为回应，俄罗斯停止了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保加利亚和芬兰等国输送天然气，减少了对丹麦、荷兰和意大利的天然气供应量，并与德国就能源问题展开了心理拉锯战。

今年6月，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溪1号”的一台涡轮机，在送往原产国加拿大维修后被扣留。自6月16日起，俄罗斯将经由“北溪1号”输送至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减至原来的40%。在德国多次呼吁下，加拿大终于将涡轮机交还德国。到了7月11日，俄罗斯又宣布将对“北溪1号”进行为期10天的年度例行检查，检修期间停止天然气供应；7月21日，“北溪1号”终于在德国人的忐忑中恢复了供气，但仅仅过了几天，俄罗斯方面称另一台涡轮机也出现故障需要维修，将管道天然气供应量减少至设计供应量的20%。

为了能够顺利过冬，德国人只好捂紧钱袋。除了节流，德国政府也在寻找能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其他能源，但到目前为止，可行方案寥寥无几。

与整个欧盟一样，德国开始进口从美国和卡塔尔等国运来的液化天然气(LNG)，但液化天然气需要海运，价格也更昂贵。目前德国正在北部沿岸修建LNG接收码头，但还得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才能竣工。而且，单靠LNG无法弥补德国的能源缺口。在全球能源供应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任何LNG设施都在满负荷运转，可以卖给德国的天然气并不多。

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纷纷宣布将重启旧的燃煤电厂，但没有哪个国家的重启煤电计划像德国这样大张旗鼓。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今年和明年冬天，德国将允许21座燃煤电厂重新启动，或在原计划关停日期到来后继续运行。

8月2日，德国贝格海姆，尼德罗塞姆燃煤电厂冷却塔冒出蒸汽。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之前增加天然气储备，德国政府正在将煤炭作为发电的替代能源之一。 视觉中国供图

位于德国萨尔州贝克斯巴赫地区的一个煤矿10年前就已关闭，留下的煤电厂只是一个消亡行业的遗迹。但如今，厂里的设备又轰鸣起来。

德国民众也开始了“自救”行动。过去，木柴只是德国人生活中的装饰品，如今却成了市面上的紧俏物资，价格翻了一番以上。一些德国人为了能安稳过冬，甚至把家里的天然气加热器换成了炉子。木材厂老板克里斯蒂安·罗森告诉《华盛顿邮报》，工人们来不及将压缩木屑颗粒制作成木柴形状，就被装上卡车运走。木柴供不应求，他只能限量出售，规定每个顾客一次只能订购三箱。

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宣布了退出核电的计划，目前德国还有3座核电站仍在运营，按计划应在今年12月底之前全部关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日前向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喊话，要求全面停止天然气发电，并将现有核电站的运营时间延长至2024年。他说：“我们必须保证在天然气危机之后不出现电力危机。不应该关闭安全且对气候友好的核电站。”

与上述种种能源危机解决办法相比，有些人的想法也许更为实际。7月27日，吕根岛市七名市长写给联邦政府官员一封联名信，呼吁联邦政府努力通过“北溪2号”管道引入天然气。信中说，“我们认为切断与俄罗斯能源联系的做法是不对的”，与俄罗斯能源“脱钩”意味着生活成本激增，并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和无法控制的动荡。

能源危机可能改变德国经济模式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充当全球“绿色发展”的急先锋，兼顾环保与经济的发展模式备受推崇。目前德国可再生能源占比约为42%，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水电。可再生能源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近70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德国总理朔尔茨上任后，政府原计划在本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加入一条：“到2035年，德国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然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了德国沉重一击。德国下院7月7日公布的法案显示，“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一条已经被删除。

与无法实现气候雄心相比，能源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更严重，迫在眉睫。分析人士指出，德国工业可能将很快失去全球竞争力。

首先，能源密集型产业可能转移到有可靠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区，比如多风的沿海地区、太阳能丰富的地中海地区，还有土耳其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这将使莱茵河沿岸和德国南部的老牌工业区“空心化”。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对德国《时代周报》表示：“我们的经济体系有崩溃的风险。一不小心，德国就可能走向‘去工业化’。”他呼吁通过和平谈判停止俄乌冲突。

其次，德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模式可能不复存在。数十年来，德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荷兰国际集团(ING)经济学家卡斯滕·布尔泽斯基指出，德国经济模式建立在廉价能源进口、全球化高度发展和制造业出口的基础之上，其中，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和运输成本低廉、价格稳定，对德国经济繁荣贡献匪浅。俄乌冲突中断了稳定的能源供应，破坏了原本成熟的全球供应链，或将终结“我们所熟知的德国经济模式”。

是重新回到燃煤或核电时代，让“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成为空话，还是重新引进廉价而稳定的俄罗斯天然气，让德国人安然度过不久后到来的这个冬天？眼下，留给德国作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到3个月了。

本报北京8月3日电